

# 近百年韩非研究综述

彭鸿程

摘要：近百年来，韩非子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结合前贤和当代有关研究，中国大陆韩非子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华民国建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一阶段是韩非子研究的兴起与蓬勃期；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韩非子研究的停滞期；八十年代后，韩非子研究进入新的发展与总结阶段。台湾地区的韩非子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海外汉学界对韩非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译介注释、思想研究、法律层面的比较研究等。回顾近百年韩非子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韩非和法家思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关键词：韩非子研究；学术回顾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2)02-0094-05

“道家、法家一张一弛，后来治术莫能外焉。”两千多年以来，老庄研究成为子学中的显学，而韩非子研究相对而言比较沉寂。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学术蓬勃发展起来。法家的研究，特别是韩非子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韩非子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回顾近百年来的韩非子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韩非和法家思想，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下文将分成中国大陆、台港以及海外韩非子研究三大块进行概述。

## 中国大陆的韩非子研究

中国大陆的韩非子研究是比较曲折的，大致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一、中华民国建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是韩非子研究的兴起与蓬勃期；二、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韩非子研究的停滞期；三、八十年代后，韩非子研究进入新的发展

与总结阶段。

一、中华民国建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2-1949)的38年，是韩非子研究的兴起与蓬勃期。

清末以来至民国时期，中国的政局并不是很稳定。军阀割据，日本侵略，国共两党纷争，等等。这种局面，不仅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学术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学术思想异常活跃。

针对社会的现状，有识之士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甚者直接进行实验(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付诸实践。子学研究的兴起，不能不说是时代思潮的回应。其中，韩非子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继承，亦有发展。继承的是乾嘉以来的学术风气和研究方法；发展的是把新文化运动以来涌进来的西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借鉴乃至融合，力图创造出自己的东西来。成果的表现形式大致有专著和期刊论文。

专著有陶鸿庆《读韩非子札记》(1912)、刘师培《韩非子斟补》(1912)、尹桐阳《韩子新释》(1919)、唐敬泉《韩非子选注》(1926)、张之纯《评注韩非子精华录》(1927)、夏中道《韩非子法意》(1927)、张陈卿《韩非的法治思想》(1930)、谢无量《韩非》(1932)、章绍烈《韩非思想之体系》(1935)、王世瑄《韩非子研究》(1936)、容肇祖《韩非子考证》(1936)、叶玉麟《白话译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老子韩非列传》，《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收稿日期：2011-09-20

作者简介：彭鸿程(1974-)，湖南双峰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文献学。

解韩非子》(1937)、陈柱《老子韩氏说》(1939)、陈启天《韩非及其政治学》(1940)、曹谦《韩非法治论》(1948)、陈启天《韩非子校释》(1940)、陈启天《韩非子参考书辑要》(1945)等。考证、注释或者校补的著作,相较乾嘉以来,是大大增加了。传统的治学方式在民国仍然是比较活跃的。至于偏重于法治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的著作,则凸显出时代学术中西结合的面貌,或者见出西学冲击下传统的回应与对策。如,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术语和逻辑推理。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材料堆砌,说理常常是浅尝辄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但在当时凭空无依的情况下,开现代学术研究之风气,为后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做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此外,通论性质或者学术入门介绍的著作对韩非子的思想或者生平、文本等多所研究。如,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1936)、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12)、吕思勉《经子解题》(1926)、蒋伯潜《诸子通考》(1948)、《诸子学纂要》(1947)、刘咸炘《子疏定本》(1931)、陈柱《诸子概论》(1932)、《子二十六论》(1935)等。

论文的数量相对于著作是比较丰富的。根据《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900-1949)的整理,研究论文最早始于1915年谢无量的《韩非》(后来以专书出版)发表,截至1948年7月,凡74篇论文,大致涉及到以下方面:文本的考辨和注释(24篇)、生平的梳理(4篇)、韩非子的思想研究(如,思想来源、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法治思想、学术史的梳理等)(26篇)。其中对《韩非子·初见秦篇》的单独研究论文达到6篇,时间跨度从1927到1947,长达21年。显然,这个时期的韩非子研究是考据与义理并重,而且,研究韩非子的思想趋向于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并特别指出韩非子思想的本质即为政治学。同时出现对韩非子学术研究的总结性论文:陈千钧《历代韩学述评》(1936)等。虽然不足以代表建国以前的学术全貌,但具有一定的学术规范意识,展现了学术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二、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韩非子研究的停滞期。

建国后的韩非子研究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是

息息相关的。走过这段历史,人们都深深意识到,政治,或者说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学术研究自然不能例外。换句话说,在这一时期,韩非子研究是政治挂帅。

这个时期的著作有陈奇猷先生校注的《韩非子集释》(1958)、《韩非子集释补》(1961)、任继愈先生的《韩非》(1962)等,其中出现得比较多的是选注选译,如孙维槐《商鞅荀况韩非论述选注》(1974)、王焕镛《韩非子选》(1974)、上海师范大学《法家人物传记资料选注》(1974)、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商君书荀子韩非子选注》(1975),不包括出版的单篇注释本,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大概十四种。陈奇猷先生继续走乾嘉考据学的路子,对韩非子的文本下了很大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韩非子集释》的再版和选注选译之类,集中出现在1974年前后,恰恰和“评法批儒”运动相呼应。有些书的扉页是《毛主席语录》,如“古为今用”等,接下来就是出版说明,强调阶级斗争。这些注译大都肯定韩非子的唯物论、对儒家的批判。注译者的身份,往往是工农兵,而且,署名的时候,工人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体现了工农专政的政体。显然,国家的意识形态左右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至于论文,《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把这个时期的韩非子研究自然地分为两个时期:1950-1966;1967-1976。这恰恰是以“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作为分期的。“文革”以前的韩非子研究论文23篇,其中有3篇书评,2篇论文在专著中发表(建国前已经发表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在报纸上的有9篇,学术刊物上的有12篇。大致可以分为考据与义理研究。考据上,考察作品《初见秦篇》的成文年代1篇,简论韩非3篇。义理则相对多一点,共有14篇。

“文革”开始之后的韩非子研究自然不再是正常的学术研究。根据《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967-1976),论文的数量达到287篇,其中,37篇是关于《韩非子》的注译,索引作为论文的附录。不论是文本注译还是思想研究,论文的中心都是儒法斗争,服务于“文革”的需要。基本上是“评法批儒”运动在学术界的延续,肯定韩非子思想的反儒。

方克立等编《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900-1949页。

方克立等编《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967-1976页。

在《韩非子》的所有篇目中,关于《五蠹》的研究论文或者注释文章,达到102篇,这是因为“五蠹”中的一“蠹”恰恰就是“儒”。显然,学术研究不再是学术研究,而体现了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掌控。诚然,学术研究离不开社会与政治,但学术应当有自己的自由与空间。尽管“文革”的学术研究没有进入正轨,却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录,也为“文革”以后学术研究的勃兴,埋下了种子。

尽管“文革”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但压抑中自有一份韩非子的犀利在(按:此处指看待社会问题客观、冷静)。1976年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完成的《韩非子校注》,“利用各大图书馆珍藏的韩子善本,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韩非子》加以全面整理”,力求达到“科学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在当时产生的法家著作整理本中,惟有这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方针,后又作了反复的修改”,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专家的好评。周勋初先生在参与编纂的过程中而有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形成《韩非子札记》。尽管该书迟至1980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却是“文革”后期学术研究平实学风之集中体现的著作。两年后,也就是1982年,《韩非子新校注》得以出版。此外,1976年,王元化先生撰写的《韩非论稿》基于自身对时局的思考,不赞成盲目提高韩非的地位,认为“近来论者在评价韩非的时候,往往模糊了法和术的界线”,指出“一部《韩非子》主要谈的是术,而不是法”。这无疑跳出了“评法批儒”的怪圈,体现出敢于说真话的气魄。学术的求真于此历历可见。

三、八十年代后,韩非子研究进入新的发展与总结阶段

十年动乱结束后,学术研究进入健康的发展轨道。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也有对学术生长点的敏锐。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对学术研究的扭曲,同时,很多学者萌发只争朝夕的学术热情,争取把丢失的宝贵时光追回来。

不可否认,对韩非子及其思想的理解,离不开对文本的注释校勘。陈奇猷先生精益求精,在《韩非子集释》、《韩非子集释补》的基础上,使用简帛等出土文献,并把对韩非子的新认识体现在新的注解上,

从而形成《韩非子新校注》。《韩非子新校注》尽管有着一些明显的错误,但仍不失为一部有着自己见解的著作。

在陈奇猷先生努力的基础上,张觉先生多年以来,先做《韩非子导读》(1990),此后二十年间,先后有《商君书·韩非子》(1990)、《韩非子全译》(1992)、《〈韩非子〉精华译评》(1993)、《韩非子选评》(2004)、《韩非子译注》(2007)、《韩非子导读》(2009)、《韩非子帝王的法术》(2009)、《韩非子校注》(2006)、《韩非子校疏》(2010)等著作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张先生的《韩非子全译》书名改成《韩非子释译》,在台湾也获得出版,而且先后出版两次,显见该书的生命力。张先生侧重译注、校勘,为韩非子的通俗化、普及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了版本比较可靠的读本。

沿着普及化的方向,《韩非子》还有高振铎、刘乾先《韩非子选译》(1990),沈玉成、郭咏志《韩非子选译》(1991),俞志慧《韩非子直解》(2000),刘乾先《韩非子译注》(2003),萧华荣《韩非散文选集》(2005),陈秉才《韩非子》(2007),陈明、王青《韩非子全译》(2008)、赵沛《韩非子》(2008),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韩非子》(2010)等书出版。

当然,诸子普及化的形式不仅仅是注译,还有戏曲、小说或者图文并茂的形式等。如:淮剧《千古韩非》(2005)、越剧《韩非子》(2008)、黄舜《韩非和李斯心史》(2007)、吴越《韩非子传奇》(2009)。

立足于文本,也有不少专著,如孙实明《韩非思想新探》(1990)、阎笑非《韩非研究丛稿》(1991)、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1996)、施觉怀《韩非评传》(2001)等,开始涉及到韩非的生平、思想成果、文化史意义等方面。而在此期间或之后连续出版的韩非子研究著作,大都是博硕士论文成果的公布。

博硕士论文是韩非子研究的重镇。根据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和中国知网博硕士论文库的检索结果,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非子的研究集中在21世纪初期。这种情形应当是诸子学或者说国学开始热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在反思传统,应对现实。目前我能检索到的博硕士论文,最早始于1992年。博士论文从1992年截至2010年,一共是

《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  
王元化《王元化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16篇。硕士论文则是84篇。论文的视域集中在语言文字、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文学成就、思想渊源等方面。尽管如此,韩非子的研究还是有进展的空间。

至于期刊论文,数量有点惊人,似乎和博硕士论文的写作有着同步的关联。如果以1980年为界的话,1980年至1989年,韩非子研究论文,平均每年12篇。1990年至2003年,平均每年20篇。2004年开始,论文数量飙升,2004年38篇,2005年45篇,2006年42篇,2007年68篇,2008年69篇,2009年80篇,2010年84篇。差不多每两三年,韩非子的论文数量就上一个台阶(这中间还不包括报纸和会议论文)。论文的研究重心和博硕士论文基本是重合的。姑且不去讨论期刊论文的质量,仅从数量上看,应当是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一些倾向的。显然,韩非子重新受到审视。背后是否有更深的动机,或者时代背景,这需要站在整个诸子研究、国学研究的层面上去考察,方能得出合理的解释。从论文的内容上看,小至字词音韵、篇章分析、版本源流,大至全书、先秦诸子乃至全球视野的比较,研究几乎触及到韩非子研究的方方面面。并且,很多地方已经超越了博硕士论文的成果(这和前文并不矛盾)。相当一部分论文运用了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文体学、管理学、经济学、建筑学等不同学科的成果。不同视角的切入,为韩非子的研究带来新的学术血液。

可以说,从80年代到今天,三十年的韩非子研究,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高度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转折。如同中国古典文学从诗词曲发展到小说、最后在明清时期出现带有总结性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一样,韩非子研究也出现带有总结性质的论文,如张觉《历代<韩非子>研究述评》等。

### 中国台港地区的韩非子研究

中国台港地区的韩非子研究相对大陆而言,一直没有断掉,而且获得一些可喜的成果。香港地区的韩非子研究相对台湾地区是比较薄弱的。仅就期刊论文而言,我所能搜索到的论文10篇,基本上发表在六、七十年代,九十年代仅1篇。专著似乎只有王德昭1967年在新亚书院出版的《马基雅弗里与韩非

思想的异同》。

台湾地区的韩非子研究一直呈平稳发展的态势。从博硕士论文的撰写来看,从1958年到2009年,硕士论文101篇,博士论文8篇。1990年以前,硕士论文的数量是25篇,而大陆的韩非子硕士论文是从2001年才开始撰写的。博士论文最早撰写于1975年,是王邦雄的《韩非子政治哲学之研究》。其时,大陆的“文革”还没有结束。显然,台湾的韩非子研究保持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博硕士论文的研究内容关乎韩非子的思想渊源、政治思想、管理思想、法律思想、教育思想、文艺观、教育思想、某一观念(如,“利”)、单篇文章的考究(如,《储说》)、韩非子文本和其他诸子的关系、文学样式或体裁等,表现出了很宽广的研究视野。与之相呼应的期刊论文,从1980年到2010年,达到300篇。论文不仅仅涵盖以上博硕士论文的研究内容,还关注韩非子思想在当代现实中的运用(譬如谢梦龙《韩非思想与期货经营管理》,《元大期货》8,民89.02)、现当代韩非子研究的考察(譬如黄文兴《<韩非子评论>著述者考办-兼跋胡拙敷<述熊正韩>手抄删定稿》,《中国书目季刊》26:1,民81.06)、韩非子的比较研究(譬如文承科《中山先生思想与韩非思想之比较研究》,《警专学报》1:7,民83.06),等等。由于两岸相当长时间缺乏学术交流,双方的韩非子研究出现诸多重叠,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至于专著,包括博硕士论文成果的发表、对平时论文发表的结集以及结合自己身世思考的结晶,出版至少10种以上。研究涉及到韩非的政治哲学、法治思想、韩非对法儒思想的贡献、单篇文章(如《难篇》)等方面的考察。值得一提的是郑良树先生《韩非子知见书目》(1993)的出版,该书不仅仅对1949年前的韩非子研究有所论列,更重要的是,对台湾地区的韩非子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近期台北县永和市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推出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其中就有多种韩非子及其著述的研究著作。这既是对韩非子研究的总结,更是对诸子学乃至整个国学的总结和开拓。毋庸讳言,台湾地区的韩非子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欣喜的。

---

张觉《历代韩非子研究述评》,《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2009年。

---

如,黄绍梅《韩非尊君学说与两汉政经形势》,张静雯《韩非法治思想研究》,2009年,第2010页。

## 海外韩非子研究

韩非子是作为法家被介绍到西方的。美欧、日本等国家研究韩非子,属于整个海外汉学研究(这里不区分汉学和中国学,大致以汉学指国外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学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般认为,海外汉学的研究往往基于其国内现实的政治需要。

海外韩非子研究包含译介和研究两个层面。翻译著作有全译本和节译本。全译本有华裔汉学家廖文奎1939年初版的《韩非子》英译本,此后,直到1964年,才有美国华兹生(Burton Watson)依据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版陈奇猷先生《韩非子集释》所作的节译本,同时参考了梁启雄、日本学者宇野哲人、竹内照男以及亚瑟·威利的翻译。研究的表现形式是著作和博硕士论文。欧美的著作分布情况是这样的:美国(1975)、瑞典(1992)、法国(1999)、德国(1994)各一种。大致是介绍和研究韩非子其人其作,如瑞典Bertil Lundahl有*Han Fei Zi: the Man and the Work*(Stockholm University, 1992)等。另外,韩非子思想的研究还往往分散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汉学家的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但不是专门论述。众所周知,著名的汉学家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就曾经在描述法家的时候,对韩非子有所阐述。同样,顾立雅在《什么是道家》中对法家的主张进行论述时自然也有对韩非子的评判。博硕士论文则主要集中在北美,20世纪70年代有2篇,2000年至今有5篇。7篇中,加拿大1篇硕士论文,其他则是美国的博士论文。论文考察韩非子思想的渊源、韩非子和慎到、申不害等其他法家的关系、韩非子的政治哲学以及《韩非子·说林篇》。

亚洲地区研究韩非子,大致以日本为重镇。就我所知,韩国成均馆大学1997年有博士论文1篇,考察韩非子法术思想形成的逻辑体系。日本名古屋大学2007年亦有博士论文1篇,考察韩非子的君主论。事实上,日本研究韩非子是很长的历史的。韩东育先生就做过相关的研究。

日本对韩非子的关注,似乎与中国有清一代以来的政局相呼应。主要表现在对《韩非子》一书的

翻刻与训读注解上。如,前者有《韩非子二十卷》日本延享3年(1746,乾隆十一年)平安书林丸屋市兵卫唐本屋吉左卫门刻本;日本宽政7年(1795)日本大阪书林柏原屋刻本等。后者有《增读韩非子二十卷》物茂卿读、蒲行方增,日本享和2年(1802)日本修文斋刻本;《韩子解诂二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附录一卷》(或题名:《韩非子解诂》)津田凤卿解诂,日本嘉永7年(1854)阳文荣堂刻本;《韩非子全书二十卷》藤泽南岳评释,日本明治17年(1884)日本东京嵩山堂刻本;《定本韩非子纂闻二十卷,附录一卷》蒲阪圆纂闻,日本昭和7年(1932)东京崇文院铅印本;《韩非子校注》(第1-3)依田利用、长沢规矩也、米山寅太郎编(东京:汲古书院1980);《韩非子国字解》松平康国(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1)等。至于研究著作,有守屋洋《韩非子 强者の人间学》(东京:PHP研究所2009),小室直树、西尾干二、市川宏《韩非子の帝王学》(东京:プレジデント社1998),茂沢方尚《<韩非子>の思想史的研究》(东京:近代文芸社1993),市川宏《韩非子:“法术”の极意をつかめ》(东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82),桥本敬司《韩非子の言语戦略》(2002),近藤廉信《韩非子のことば:唯物论的法治主义の国家论》(韩非子的语言:唯物论的法治主义国家论·黎明书房,1968)等。研究的侧重点大致在于韩非子的思想史意义、韩非子的组织管理学、韩非子的帝王之术等。似乎可以认为,日本的韩非子研究承接中国的乾嘉学术,立足于文本,面向现实。

综上所述,国内和港台的韩非子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并在借鉴西方学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大陆的韩非子研究在非常时期和政治结合极其紧密。改革开放后的韩非子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似乎有点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毛泽东同志强调古为今用,至今仍可为学术研究之圭臬。

海外的韩非子研究也有比较可观的成果。但都是基于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借以反观其自身文化之优劣,并寻求解决之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更能够给予韩非子的研究以一些新的视野和激励。

(责任编辑:陈剑)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